

湖南省水利志

第三分册

湖南省水利志第三分册

洞庭湖区水利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

编辑说明

《洞庭湖区水利》是《湖南省水利志》的第三分册，也是本志的第三篇。

洞庭湖区位于东经 $111^{\circ}40'$ ~ $113^{\circ}10'$ 、北纬 $28^{\circ}30'$ ~ $30^{\circ}20'$ 之间，区辖范围系指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枝城~城陵矶)以南、京广铁路(长沙~城陵矶路段)以西、长常桃公路(长沙~益阳~常德~桃源路段)以北和太阳山~凤凰山~嘉山以及枝柳铁路(枝城~石门路段)以东的广大平原湖泊水网地区，海拔高程变幅约25~50米。洞庭湖区总面积18780平方公里，其中湖南15200平方公里，湖北3580平方公里。现有天然湖泊面积2691平方公里，其中东洞庭湖1328平方公里、南洞庭湖920平方公里、目平湖349平方公里、七里湖94平方公里。现有堤垸控制面积12609平方公里，其中湖南9323平方公里，加上四水尾闾受堤防保护的面积895平方公里，合计为10218平方公里。

湖南习称的洞庭湖区按现有行政区划共辖三个地区(常德、益阳、岳阳)，四个市(长沙、岳阳、株洲、湘潭)，十九个县、七个县级市(常德县市、汉寿、安乡、澧县、津市、桃源、临澧、益阳县市、沅江、南县、长沙县及市郊、望城、宁乡、株洲县及市郊、湘潭县及市郊、岳阳县及市郊、湘阴、临湘、汨罗、华容)。其中纯湖区占12个县、4个市，四水尾闾占7个县、3个市郊。此外还有十五个国营农场(溁澹、西洞庭、西湖、贺家山、茶盘洲、千山红、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南湾湖、钱粮湖、君山、建新、黄盖湖、屈原)。湖区总面积15200平方公里，占全省的 $1/14$ ；人口598万，占全省的 $1/9$ ；耕地868万亩，占全省的 $1/6$ 。1983年粮食产量84亿斤，占全省的 $1/6$ ；1982年棉花总产量134万担，占全省的 $2/3$ ；1980年水产112万担，占全省的 $1/3$ 。常年上交征购粮18亿斤，占全省的 $1/3$ ；外调出省商品粮(大米)约10亿斤，占全省的 $1/2$ 。其他如油料、麻类、湘莲、牲猪、家禽等等，都占重要比例。它是一个以粮为主、多种农产品综合经营的商品生产基地，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洞庭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唐、宋时期“周极八百里”，清中叶以后又迅速淤塞萎缩成为目前的湖沼平原地貌。这是它独特的地质地貌条件、水文条件和人类活动条件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结果，而荆江河段向南分流所肇致的复杂江湖关系，则是其中极为活跃的一个因素。荆江来水扩大了洞庭湖，荆江来沙又淤塞了洞庭湖，终至使八百里洞庭淤出八百万亩良田。湖区堤垸的形成和兴废是江湖关系历史演变作用下的必然发展，而历代推行的一些治水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关系的激化。演变至今，湖区堤垸受长江洪水的威胁日益加重，而洞庭湖的消亡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江湖关系的演变，江湖治理成为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早在荆江九穴十三口逐渐淤塞的年代，就出现了重开穴口与堵塞穴口之争；荆江四口南流局面形成前后，又存在南北分流与舍南救北之争；二十世纪以来，对以蓄为主或以泄为主以及向洞庭分流蓄洪为主或向荆北分流蓄洪为主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所有这些争论尽管观点截然相反，但仍各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并包含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对研究江湖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百年来的湖区水利大都仅限于治标，这是因为自明、清以来的治水方针偏向于舍

南救北，湖区就只能维持现状、侥幸苟安。其结果是：舍南未能救北且走向反面，苟安无从侥幸且使江湖关系愈趋恶化。建国三十多年来，湖区水利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总的治湖方略是正确的；虽也存在某些失误，仍从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但要从根本上治理洞庭湖，还有待以长江三峡枢纽为主体的山谷水库的陆续修建并配合其它防洪工程措施。这样，才能解决荆江的来水来沙问题，使洞庭湖发挥它应有的调蓄作用。

《洞庭湖区水利》篇分为：荆江与洞庭的江湖关系，湖区的筑堤、围垸与湖洲，湖区洪水与洪涝灾害，江湖治理意见和洞庭湖治理规划，湖区水利建设，湖区水利管理等六章。前四章早在1982年11月写出初稿并于1983年元月召开了审稿会，参加审稿的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丁福五、副总工程师王源，湖北省水利局副局长涂建堂，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粟宗嵩，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粟翼寰、彭公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室主任张修桂，《长江志》编辑原更生、周树勋，《湖北水利志》副总编辑曹健民，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李鑑澄，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张敦周、规划室副主任梁熙杰，湖南省水利厅洞庭湖工程处处长许大珠及工程师方罗山、钟宇平、聂芳容，常德地区水电局局长周大力，岳阳地区水电局局长王堆金，益阳地区水电局工程师薛忠元等。此外，湖南师范学院地理系何业恒副教授、卞鸿翔讲师在审阅初稿后用书面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上述基础上对第一次初稿作了较多的修改并于1984年4月写出二稿，该稿于1984年11月报送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主持召开的全国省志稿评议会议。本次付印前，对章节作了一些调整，内容也有所充实。

本篇各章初稿由下述同志执笔编写：第一、二、三章，邓谷君；第四章，雷永肃、杨家兴；第五章，钟宇平、雷永肃；第六章，方罗山。提供和整理资料的有：胡咏球、陶欣一等同志。最后，邓谷君同志对全篇作了通改定稿。

本篇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内水利、历史、地理学界以及从事洞庭湖区水利工作多年的老前辈、老专家的关怀和帮助，得到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洞庭湖水利工程局和湖区各地、县水电局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不高，阅读的史藉也极为有限，缺点和错误均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湖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九月

洞庭湖区水利

目 录

第一章	荆江与洞庭的江湖关系	1
第一节	公元十五世纪以前的江湖关系	1
第二节	公元十六世纪至今的江湖关系	4
一、	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4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8
第二章	湖区的筑堤、围垸与湖洲	18
第一节	宋元时期 (960—1368)	18
第二节	明清时期 (1368—1911)	19
第三节	民国时期 (1912—1949)	25
一、	堤垸	25
二、	洲土	26
第四节	建国至今 (1949—1984)	31
一、	堤垸	31
二、	湖洲	46
三、	围垦与废田还湖	49
四、	内湖与湖区水运	49
第三章	湖区洪水与洪涝灾害	52
第一节	湖区洪水	52
第二节	洪涝灾害	55
第四章	江湖治理意见和洞庭湖治理规划	60
第一节	江湖治理意见	60
第二节	洞庭湖治理规划	62
一、	划定洞庭湖湖界报告	62
二、	整理洞庭湖工程计划	63
三、	洞庭湖区水利建设规划	63
四、	洞庭湖区防洪蓄洪建设规划	65
五、	洞庭湖区近期治理工程总体规划	66

第五章	湖区水利建设	71
第一节	湖区水利建设综述.....	71
第二节	防洪建设.....	75
一、	1949年修复溃损堤垸.....	75
二、	1952年整修南洞庭湖.....	76
三、	1954年治理洞庭湖.....	77
四、	淞澧分流.....	78
五、	防洪大圈.....	79
第三节	排涝建设.....	80
一、	机排.....	80
二、	电排.....	81
三、	涵闸.....	89
四、	撇洪.....	89
第四节	蓄洪建设.....	90
一、	大通湖蓄洪垦殖试验区.....	90
二、	历年分蓄洪情况及蓄洪建设.....	90
三、	蓄洪堤垸的确定与安全建设措施.....	94
第六章	湖区水利管理	97
第一节	堤垸的管理机构.....	97
第二节	堤垸的水利管理.....	99
第三节	防汛抢险和洪道管理.....	101

附录

洞庭湖区堤垸基本情况表（一）.....	105
洞庭湖区堤垸基本情况表（二）.....	130
洞庭湖区万亩以上防洪圈基本情况简表.....	154

第一章

荆江与洞庭的江湖关系

洞庭湖自形成至今，屡经沧桑变化。这是它独特的地质地貌条件、水文条件和人类活动条件相互制约的结果，而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向南分流进入洞庭湖所肇致的复杂江湖关系则是其中较为活跃的一个因素。

今日的洞庭湖“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汇入洞庭湖的水沙北则来自荆江三口，南则来自湘、资、沅、澧四水。荆江向南分流所构成的江湖相通局面，对洞庭湖湖底的淤积、湖泊的天然调蓄能力以及湖区水流汇流过程的变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伴之而来的是湖洲的淤升陆沉和堤垸的兴废变迁，使洞庭历尽沧桑。

第一节 公元十五世纪以前的江湖关系

洞庭湖区是中生代早白垩世初燕山运动中所形成的地堑型盆地，最初仅形成为若干孤立的山洼包括常桃凹陷、沅江凹陷、汨罗凹陷和宁乡凹陷。早白垩世晚期，湖盆缓慢下沉并向东扩大，汨罗和宁乡凹陷合为一体且与沅江、常桃凹陷水体相连，进入晚白垩世后，湖盆向北西扩展，澧县凹陷于此时形成。第三纪的古新世和早始新世早期，湖盆开始萎缩并分割为数个孤立的小湖盆；至早渐新世，除沅江凹陷外均先后衰亡；到第三纪末，沅江凹陷也终于消失，从而终结了第一代洞庭盆地的历史。第四纪开始，本区重新下沉而导致第二代洞庭盆地的出现。早更新世时，盆地的东南隅和西北隅地势较高，其余为平原与洼地。此时，湘、资、沅、澧四水及其主要支流均已形成，在平原上交织成为河网，或集注于洼地而成湖泊，呈现为森林沼泽景观^①。中更新世晚期是洞庭盆地发展的最盛时期，其范围很广可能包括现今的洞庭、江汉平原；全新世以来，湖盆又开始萎缩，其构架基本上为现阶段所见的洞庭盆地^②。

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以后至公元六世纪以前，洞庭湖的水域范围和江湖相通情况至今尚不够清晰。西汉（前206—公元8年）末年通行于世的《山海经·中山经》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湖，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这句话可理解为湘、沅、澧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而“九江”历来均认为即指洞庭湖。《水经》称“九江地在长沙下雋县西北”，今人考证“下雋县在今湖南汨罗、岳阳之间的新墙河口，证明九江即洞庭无疑”^③。《山海经》是战国（前475—221）后期的作品，反映了“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的地理情况”，虽有虚夸，但“采用了不

少真实的地理资料”④。系统记述全国水道的《水经》一书，对湘、沅、澧水均直接称“入江”，仅资水载明为“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江”。但酃道元的《水经注》则称：“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并称“湖水广园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水经注》成书于六世纪二十年代，而“湖水广园五百里”的话据《水经注疏》考证“本王逸楚辞注”。王逸为东汉时期的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其描述当较可信。这一时期的江湖相通情况，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至今仍存在较多争论。明末文学家袁中道(1570—1673)的《澧游记》中提出了长江主泓在五世纪以前南注洞庭之说，清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4)在《禹贡锥指》一书中对袁说加以肯定，并说江水由虎渡口“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荆江河床的演变”一节中指出：“从江陵荆南古地貌分析，先秦至汉唐时期，长江根本不可能走虎渡河南注洞庭”；当时的长江主泓，“大体上沿今荆江流路至城陵矶合洞庭四水”。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卞鸿翔和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龚循礼对江湖相通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先秦时代“洞庭湖不仅接纳四水，而且两路通江……东口在今君山附近，即今洞庭湖口；西口又称洧浦或洧阳浦，地在今湖北沙市至公安间”。并认为“东汉末发生一次重大的江湖关系转变，洞庭湖西北的油水故道由南注洞庭改为北入长江，从此洞庭湖不再接受来自上荆江的分水分沙……先秦时期的洞庭巨浸处于日益缩小之中”⑤。复旦大学地理系张修桂则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先秦汉晋时代的洞庭湖，尚属地区性的小湖泊”；至东晋、南朝之际，“在公安油口下游的荆江南岸出现景口、沧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而成的强盛沧水……在今华容县西横断澧水故道，于南山一明山一线以西的今南县附近潜汇成湖……称赤沙湖。湖水东北通过生江口与荆江沟通，南面由沙口注澧共汇洞庭湖”⑥。《水经注·江水》载：江水“东经公安县北……县有油水，水东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东有沧口，沧水南与景水合，又南通澧水及诸陵湖”。《水经注疏》称：“澧水注赤沙湖，水南注澧盖此所通之陂湖”。可见，《水经注》时代的洞庭湖是通过景口、沧口与荆江相通的，但景口、沧口形成的时间尚缺史料可考。

洞庭湖是否包括在先秦九薮之一的古云梦泽范围，历来也众说纷纭。首先提出云梦泽“跨江南北”的是西晋的杜预(222—234)，他认为春秋时江南、江北都有云梦泽，对江南的不肯定，只称：“或曰，南郡华容县东南有巴邱湖，江南之云梦也”(《春秋释例·土地名》)。至东晋时，郭璞(276—324)注《尔雅》改用肯定的口气说：“今南郡华容县东南巴邱湖是也”。自此，这一说法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袭用。“杜预把位于当时华容县(今江陵东百里)东南方的巴邱湖作为云梦泽，表面上似乎符合《汉书·地理志》云梦泽在华容县南、《水经》云梦泽在华容县东的说法。其实不然，《汉志》、《水经》所谓在某县某方位，所指均在这个县境之内，汉华容县境在大江之北，江南的洞庭湖区当时属长沙郡益阳、下雋两县管辖。可见《汉志》、《水经》中的云梦泽在今之江汉平原之内，它不可能就是、也不可能包括洞庭湖”⑦。

位于江汉平原的云梦泽因长江与汉水横贯其中，大量泥沙的沉积为云梦泽的衰亡与汉河沙滩的发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下荆江河床也在云梦泽衰亡过程中逐渐孕育形成。据《水经注》记载，河床两岸形成许多穴口和汉流分泄荆江流量，在下荆江北岸的有高

口、故市口、子夏口、侯台水口、青阳口、土坞口、饭筐上口和饭筐下口，南岸有龙穴水口、俞口、清水口和生江口等；河床中沙洲非常发育，分汊穴口附近均有大小不等的沙洲沉积。因而，当时下荆江河床属于分汊型河床；它的水文特征是河床水位变幅小、流量比较均匀、洪水过程极不显著。由于“诸穴畅通，故江患差少”；虽当时江湖相通，但江湖关系是较为稳定的。

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水域范围已有较明确的记载。成书于唐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志》岳州巴陵县（今岳阳）载：“洞庭湖在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青草湖在县南九十里，周回二百六十五里”。北宋范致明撰《岳阳风土记》称，每值“夏秋水涨”，华容县西南的赤沙湖与“洞庭洪通”。赤沙湖则“周回百七十里”（明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据此可知，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在夏秋水涨时连成一片，三者按“周回”计共达七百多里。故宋代的《皇朝郡县志》称：“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洞庭七八百里一语，还广泛见于唐宋文人的诗词。如唐僧可明《赋洞庭》诗：“周际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全唐诗》卷849）。北宋梅尧臣的诗句也说：“风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看”（引自《輿地纪胜》卷69）。《岳阳风土记》还有如下记载：“大抵湖上舟行，虽沂流而遇顺风，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由岳阳西行至澧州口、鼎州江口约四日程，南至沅江县为四日程。”作为行舟里程而言，与梅尧臣的“风帆满目八百里”是一致的。

七至十五世纪的江湖相通情况，文献记载仍不够明晰。《水经注》时代“沧水南与景水合又南通澧水”注入赤沙湖的情况，在北宋的《岳阳风土记》中仍有记述：华容县西紫港湖“夏秋水涨与赤沙湖会，北通于江”。道光《洞庭湖志》同样引用，称“紫港湖在（华容）县西，《风土记》与洞庭会北通于江”。至元代林元撰的《重开古穴碑记》（载《荆州万城堤志》）提到了“古有九穴十三口，沿江之南北以导荆水之流”和南宋“塞南北诸古穴”的话。文中仅提及“闻于朝廷”下令重开六穴的名称：江陵郝穴，监利赤剝穴和石首的杨林穴、宋穴、调弦穴、小岳穴。清同治《湖北通志》于上述六穴之外另加松滋采穴、江陵獠扑穴和潜江里穴，“合而为九穴”，但“十三口无考”。《荆州万城堤志》则称除上述九穴外，另加虎渡、油河、柳子、罗堰四口，“九穴四口合为十三，非九穴之外别有十三口”。上述穴口中，向南分流的五处，向北分流的八处（据林承坤、陈钦奎《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一文）。南宋“回荆留屯之策”而“塞南北诸古穴”（《重开古穴碑记》），元代重开六穴（《读史方輿纪要》称仅开小岳、宋、调弦、赤剝四穴），但至“元顺帝之末（1368），诸穴复湮；南惟虎渡，北惟郝穴”（清黄海仪《荆江洞庭利害考》）。明隆庆中（1567—1672）疏浚了调弦，但属向北分流。据《读史方輿纪要》荆州府石首县载：“调弦口镇，县东六十里，江北岸；江水溢则由此泄入监利县境，汇于潜沔”。至于虎渡口和虎渡河形成的时期，尚无足够史料证实。江陵虎渡之名虽最早见于《后汉书》，北宋人张景也有过“两岸绿杨遮虎渡”的诗句（见同治《公安县志》），但不能据此得出当时已存在虎渡口和虎渡河的结论。《輿地纪胜》载，南宋乾道四年（1168）荆江大水，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徙人决虎渡堤，以杀水势”。《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也有同样记载，并称该堤于乾道七年（1171）

由“漕臣李焘复修之”。可以认为，当时堤名虎渡但无分泄江流水道，方滋才不得不于夜间掘堤扒口。如认为当时确为分流穴口且已存在虎渡河，则三年后用不着再“复修之”。

荆江从北岸穴口多于南岸改为两口南北分流的历史演变表明：分流大的一岸地势将逐渐淤高，淤高岸穴口则将逐渐淤塞封闭。其所以尚南有虎渡、北有郝穴分流，明末清初的史学家、经学家顾炎武（1613—1682）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虎渡流往澧江同入洞庭，江南之溪水俱注之；郝穴流出汉口与大江复合，而江北之溪水俱注之。众水会合则流行不绝，注泄有壑则水道不壅，此二穴所以独存也”。这种南北二口分流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初中期。

第二节 公元十六世纪至今的江湖关系

荆江北岸分流的郝穴于十六世纪初中期堵塞，仅留虎渡一口南流；十九世纪后期，荆江四口南流局面终于形成。由于荆江水沙大量南倾，洞庭湖首先迅速扩大随又急剧萎缩；而四口来水与洞庭四水在湖中纵横交错、相互顶托，又肇致了极为复杂的汇流流出过程。从十六世纪至今的四百多年间，江湖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洞庭湖面貌也随之全面改观。

一、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十六世纪初中期的明嘉靖年间，荆江北岸堵塞郝穴。堵塞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清乾隆《荆州府志》、光绪《湖北通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称为“明嘉靖初”，光绪《湘阴县志》及《华容县志》记为“明嘉靖三年（1524）”，雍正《湖广通志》江陵县堤考略则载为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隆庆（1567—1772）中，以“郝穴与虎渡为大江南北分泄要口，无容浅塞”，曾拟议开通郝穴，但仅疏浚北岸的调弦至清初又湮（以上均据乾隆《荆州府志》）。清乾隆九年（1744）御史张汉再次提出开通郝穴的意见，他在《请疏通江汉水利》一疏中作了如下分析：“今也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发，陡高数丈，无路分泄，田庐即为巨浸；应疏复郝穴，以资宣泄”。当时的湖广总督鄂弥达对此持反对意见，复奏称：“疏郝穴使江水从雅角庙东注，夫东注则江水必入于汉水，方欲疏汉以杀汉之势，又引江水以灌之，此盖未便置议者也”。郝穴自此未再疏复，《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作了如下按语：“郝穴、虎渡为大江南北岸分泄要口，明嘉靖初筑塞郝穴，大江遂溢”。明隆庆中曾疏浚的调弦洪道，至明末已逐渐扩展成为大江正流，调弦演变成为荆江南岸要地（据《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三节的“荆江河床的演变”），调弦自此南流。清道光十三年（1833）时，御史黄爵滋在《条陈江汉修防事宜疏》中就提到：“虎渡、调弦二穴在江之南岸，尚可分泄江流以达洞庭湖而仍归于江”（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可见，当时荆江是两口南流的。“虎渡之外又增调弦，江之分注专属于南”（黄海仪《荆江洞庭利害考》）的结果，既抬高了与荆江

相通的东洞庭湖洪水位，又倒灌进入西、南洞庭湖，顶托资、沅、澧水，迫使湖区的部分低洼地带沦为泽国。巴陵县的洞庭村在两口南注后“成为无何有之乡”，华容“西里半壁绝炊烟”（均据光绪《湖南通志》堤堰篇引文）；而虎渡、调弦两口进入的泥沙在洞庭西北部所形成的水下三角洲也逐渐形成发育，前缘到达汉寿东北和沅江西北的赤山北侧，又进一步逼水南侵使沅江县的部分低地“逐步遭淹，田多芜没”（据嘉庆《沅江县志》）。从而，洞庭湖水面迅速扩展。距堵口后约二百年的雍正九年（1731）的修建舵杆洲石台的奏书中，就有“洞庭一湖，绵亘八百余里，自岳州出湖，以君山为标准，一望杳渺，横无际涯”的记述。道光《洞庭湖志》也称：“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今常德）、龙阳（今汉寿）、沅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据该志卷一所附洞庭湖全图估算，当时的洞庭湖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

清咸丰二年（1852），湖北省石首县荆江南岸藕池镇“马林之江堤溃，民力拮据未修”（据同治《石首县志》）；咸丰十年（1860）荆江大水，原溃口之下冲成藕池河。藕池溃口原因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查勘藕池的奏疏中说：“藕池为荆江南岸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逼江溜直趋南岸，藕池正当西南顶湾之处，咸丰二年遂致冲成巨口，分引大溜”（载《荆州万城堤续志》卷末）。《南县乡土笔记》则根据“当地父老有言”：“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拟向藕池方面开口消泄以杀水势；南岸不肯掘口，驻防将军用大炮对准南岸轰击，抢险人群纷纷逃命，南岸遂溃”。汉寿人徐蔚华在撰写的《洞庭湖七十年变迁记》一文中，对咸丰十年涨水情况有如下记述：“我境距藕池二、三百里，亲睹湖水逆流一日涨至尺余。宅庐淹没，先父挈家人于赤山之桃林冲构棚而居，予日牧羊大山坳、鞍子岭。九秋水消，始归故里”。据《南县乡土笔记》记载：“咸丰十年所有宋田山附近圻田的黄熟之谷以及丘墓牲畜，均悉被淹没；壮者散而四方，老弱转乎沟壑”。藕池溃口是江湖关系进一步激化的关键事件，不到三十年即在洞庭西湖一带淤出大片洲土。湖南巡抚王文韶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筹办洞庭淤洲情形片》中写道：“自荆江南岸藕池溃口，江水横决而南，挟泥沙以趋洞庭，沙沉淤积，西湖一带渐次成洲。现合龙阳、华容、安乡三县境计之，广袤几二百里，土人名之曰南洲……湖中之水既渐变而为田，湖外之田将胥变而为水，此必然之势也”（载《湖田保安志》卷21）。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京官刑部郎中张闳锦和汉寿士绅胡树荣、梅安等曾联名提出堵塞藕池口的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勘明藕池等口碍难堵筑疏》中以“自咸丰二年藕池溃口以来，四十余年南北相安无事”为词加以拒绝。并声称：“若一旦堵塞，荆民必群起相争。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必将与堤为仇，即使强欲议堵，此工亦恐难成”。他还说：“实测今日藕池溃口之水，较之昔年初溃时已减其半。现在入藕池口门内数里即有淤沙，沙日垫则水日缓，以后入口之水自当日见其减……若仅塞藕池而不能铲去南洲，则未必大利于湖南而先有害于湖北。加之费既太巨，工亦难成，办理实无把握”。

清同治九年（1870），湖北省松滋县境荆江南岸“庞家湾（今新江口）、黄家铺（今沙道观）堤溃……同治十二年（1873），黄家铺堤复溃，至今未能堵塞”（民国二十六年《松滋县志》）。黄家铺溃口不塞形成松滋口并冲成松滋河，荆江四口（虎渡、

调弦、藕池、松滋)南流局面自此形成。荆江四口之所以形成,民国三年李国栋拟具的《两湖水利条陈》中提出如下看法:“自荆江郝穴堵塞,仅存调弦一穴、虎渡一口……沿江两岸各县十年九灾……是以奏请加修北岸万城堤及嘉鱼、江夏江堤,以资保障。万城堤未加修以前,南北两岸对峙,水患平均;万城堤加修以后,南岸低北岸一丈有余,故咸丰二年藕池口溃,同治九年有松滋口溃”。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六月上报的《查勘堤工摺》称:“自咸丰以来,石首之藕池口、公安之斗湖口、江陵之毛杨二尖、松滋之黄家埠(铺)等处相继溃口,荆江分流入湖;盛涨之时,虎渡、调弦二口江溜均仍系南趋,得以分泄江水。北岸滨江各险,江水冲激之力少减,是以历年得免漫决之患”。他在《察看藕池口情形片》中也察觉了荆江泥沙南倾的后果,他说:“江水入湖挟泥沙以南趋,西湖一带淤地成洲……淤洲日宽,湖面愈狭,内水阻遏不消,滨湖州县胥受其灾”。至十九世纪末,湖区西北部泥沙淤积的水下三角洲南部前缘到达今武圣宫一带,东部前缘在注滋口附近。原在湖中的苍梧山、明山、古楼山均已靠岸上陆,团山、寄山也已在高洲之中。东洞庭地区的湖面也淤出大片洲土,如武岗洲、南大市及君山周围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四章第三节的《洞庭湖的演变》)。根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绘制的《湖南全省舆地图表》量算,当时洞庭湖的面积约为5400平方公里。

四口水沙对洞庭湖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于1947年查勘后曾作如下评述:“松滋口最大而距湖较远,其所挟泥沙中途即舍,入湖者微;太平口较之略近而水量甚小,所携泥沙已舍于口门成洲浅,不啻天然之坝,冬季水小则全涸;调弦距湖最近而最小,入湖水量少而暂,寻常皆湖水由此出流耳;四口之中唯藕池最大,其水其泥皆与湖之生命相关至切”(载《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47年10月)。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实测资料,1931年四口的最大流量分别为:松滋7650秒立米,太平(虎渡)2390秒立米,藕池16080秒立米,调弦1285秒立米。四口共为27405秒立米,占当年枝江最大流量49000秒立米的半数以上。1934年实测的四口及四水流入洞庭湖的沙量分别为:四口为2.62亿立米,四水为0.24亿立米,两计为2.86亿立米;而由城陵矶流入长江的沙量为0.44亿立米,即当年留湖沙量达2.42亿立米(以上实测数据均引自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36年编印的《扬子江中游之危机及其初步首要整治工程》一文)。从而“调弦口之水淤成华(容)、岳(阳)二县湖田,藕池口之水淤成南县全县面积及沅(江)、湘(阴)各县洲土,虎渡及松滋二口之水淤成澧(县)、安(乡)、常(德)、汉(寿)等县障垸。昔之八百里渺渺洞庭,今则南阡北陌,一望皆田”(王恢先撰《整理湖南水道商榷书》,1932年七月)。

荆江四口南流以后,四口之水与洞庭四水同汇洞庭,从而肇致了相互夺流改道和阻碍顶托的现象。荆江在虎渡、调弦两口南流时期,据道光《洞庭湖志》洞庭湖舆图所绘的水道路线,虎渡河大致从黑狗挡南流至雷打埠会澧水后经安乡至白蚌口入湖,华容河则自华容西南流至化子坟经县河口由九斤麻入湖。藕池、松滋相继决口以后,由民国初年绘制的《洞庭湖军用地图》看出:华容河故道为藕池江流所夺并被迫东流由苍梧台入湖,虎渡河故道也为松滋江流所夺而东移。至1947年时,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查勘团的查勘报告有如下记述:“四口与四水入湖之水,除湘、资二水及调弦、藕池之一部分入洞庭

东湖外，其余在赤山附近会合东入洞庭西湖再北行经东湖入江。已往自赤山南咀东行之深泓，经白沙洲、塞波咀至磊石山与湘水会合，但此段河槽已逐渐淤为平陆，湖中沙洲已由白沙洲向南伸展，其东之洲土沿潭家岭、朱家咀、坪潭岭之南岸扩展，自白沙洲经潭家岭至坪潭岭已成一片平陆，而对岸合兴废垸、车子骑垸等则在加速崩塌之中”。

“湘水至濠河口分东西两泓，东泓经湘阴北流，西泓经临资口至芦林潭复与东泓会合，北流经营田、磊石山直注洞庭东湖。惟临资口有水自资水倒灌入西泓，有时且可逆流至濠河口夺入东泓。资水自毛角口以下有三支，一经芷湖口至明山朗山入洞庭西湖，一经南湖洲、王家河入洞庭西湖，一经临资口入湘水。沅水自常德经流碧潭后分为两泓，干泓穿围堤湖至接港口，分支则由流碧潭北流，经流花口崇河入鱈鱼湖。但如澧水猛涨，鱈鱼湖之水也可倒灌入沅。接港口以下，一由大连障之南经赤山之小河咀入洞庭西湖，一由大连障之东入目平湖，一由鸭子港葡萄咀入目平湖，一由西港入天心湖、唐氏湖。每当澧水与松滋、太平、藕池涨水时，均可由此倒灌而入沅，致使接港口以下之水均由南支回旋，宣泄困难。澧水自澧县黄河湾向东南注，稍折向东北经津市复东南行，依七里湖东岸至汇口，与松滋、太平之水次第会合，在此分一部分水流南注入鱈鱼湖，其正干则自汇口转折东南行，经安乡、白蚌口至瓦连茨，由唐氏湖、赤山之南东流入洞庭西湖。由于松滋、太平、藕池之水会合交叉达十余处，情形甚为复杂”。李仪祉在《整理洞庭湖之意见》一文中对八水汇注洞庭的情况曾作如下描述：“湘、资、沅、澧四水同归于湖，而水道交错紊乱，互相触碍，故澧可以乱沅，沅可以乱资，而资又可以乱湘；又加以扬子江洪水由四口倒灌而入，纵冲横碰，四水之流更乱。其乱也或两流对逆，或错综倒向，泥沙之沉淀多在是等处。水既傍徨若失路，则其归于湖也不顺，归于湖也不顺，则其入江也不利”。由于八水在湖中纵横交错，互相干扰顶托，造成局部地区水位壅高，而江湖水位关系乃因而益趋复杂。“洞庭湖有时以城陵矶水位高涨之拥阻，可暂时积蓄相当水量，有时以城陵矶水位之低落，而尽量宣泄”；“洞庭之蓄水，全恃城陵矶水位之拥阻而回波入湖；如无此拥阻力时，则洞庭实为扬子江之一叉道”（朱士俊撰《洞庭湖与扬子江中游》，载《水利月刊》第八卷第三期，1935年3月）。

自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四口、四水泥沙在湖内淤积的结果，洞庭湖终于被分裂为若干湖泊。据1940年孙辅世的《洞庭湖之防洪》一文记载：“在岳阳华容之间为东湖，北滨江流，西岸为华容，南岸为淤成之半岛所环抱，东岸自岳阳直至湘阴之磊石山，湖身西北高、东南低。楼西湾至黄公垸一带，为江流与洞庭湖距离最近之处，夏秋之际，水位高涨，则江湖相通，其流向大抵由江入湖居多，间亦有时由湖注江。该段江湖水位相差无多，溜势不涌，其浸溢横流，尚不足为是段江湖之害。在沅江、湘阴、益阳、汉寿之间为西湖，西岸为赤山，北为淤成之半岛，南为湘、资两水之冲积滩岸，东合湘水，湖中几全为旧围废垸与洲滩侵占。夏秋泛涨，尚具汪洋之势；冬春涸落，则流水回绕于淤滩之间，浅处只有寸余，深处不过三四公寸，即航运之利亦为绝无。在较深处之稍具湖形者，仅有西北边之篙竹湖、杨林湖、邹溪湖、彭湖及滨沅江之万子湖，湘江以西之荷叶湖、横岭湖，湘江东之莽麦湖、古湖等零星湖泊。第三部分为沅江、常德、澧县之间的洞庭湖，已不复有整个之湖形，而分裂为若干较小之湖泊。其东为赤山与西湖相隔，仅赖赤山南北两端之狭窄水道，以东泄沅、澧两江及松滋、太平两口水。赤

山为湖中一孤岛，南北长约24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蓄泄至为不畅。泛涨时，堤垸多有溃决还湖者，如围堤湖、大连障其最著者也。本区现尚可为停蓄之用者，仅有西北之鱣鱼湖、黄珠湖、大洋湖，西之围堤湖，西南之南湖、洋淘湖以及东之天心湖、目平湖等”。又根据湖南省滨湖洲土视察团1946年10月的调查，当时“洞庭东湖湖面的三分之二已淤积成洲，所余水面纵横不过六十里许，平均水深不及二尺。洞庭西湖也已缩小至三分之一，陈雅湖、木查湖、彭湖、铁尺湖、万子湖、篙竹湖等过去均系水连一片，近年因淤洲突起已割裂为无数小湖，而蚌石、青山等小岛则淤扩为万顷良田。大通湖四周均挽修成垸，江水及南来诸水均未能入湖，泥沙淤淀颇少，惟湖口当隆庆老河出口，挟泥沙甚重，近三十年来淤成洲者星罗棋布，使湖水外泄困难，沿岸田庐有陆沉之势。常汉诸湖泊变化更大，常德的白芷、文殊、冲天、积儿、挖窖等湖原皆一片汪洋，自二十七八年以来，西湖口西南纵横数十里淤成沃壤，四美堂以南湖已成陆。汉寿目平、大洋、黄珠诸湖现仅余一宽数里之水道，余则已挽修成垸或芦林丛生皆成陆地”。长江水利工程总局于1947年12月组成的洞庭湖查勘团在《洞庭湖计划会勘报告》（载《长江水利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48年6月）中指出：“洞庭东湖区淤淀甚速，近数年间自注滋口以东沿湖一带，每年平均淤高自六公寸至八公寸，冬季枯水时水深仅一、二公寸，夏秋尚有相当水深；洞庭西湖区多系零星湖泊与废垸组合而成，自白沙洲经谭家岭至朱家咀一带之湖岸已向南伸展；目平湖稍有淤积；围堤湖大部系废垸所成，除西南部略有淤积外，东部甚少淤淀，且围堤湖以东各垸如大连障等有废弃趋势。盖以洞庭湖由江水挟入之泥沙，逐渐由天心湖、目平湖南移，水位因以抬高所致”。该报告所附《整理洞庭湖工程计划》提到：“洞庭湖之面积，据湖南建设厅实测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及193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之划定湖界报告为4700平方公里；惟据1947年湖南省政府之洲土视察报告，洞庭湖由于淤淀与任意围垦已缩减至3100余平方公里^⑧。十余年间缩减约达三分之一，程度之速殊属惊人”。该计划还称：“据历年含沙量测量，平均每年由四口入湖之泥沙为139252000立方公尺，由四水入湖之泥沙为16123000立方公尺，由岳阳流出者为26570000立方公尺，淤淀在湖内者为128805000立方公尺，此洞庭湖湖面与容积缩减之主要原因”。该计划还表明了如下观点：“在高水时期，长江调弦以下之泄水量仅为枝江的百分之四十，而四口分泄者则达百分之六十，故荆河不能无四口之分泄”。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荆江南流局面并未改变，仅因调弦口建闸控制^⑨，在自然情况下经常分流的只有松滋、太平与藕池三口。因而，三十多年来洞庭湖仍在进一步淤塞萎缩；但随着三口口门的淤塞和荆江的系统裁弯^⑩，江湖关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1979年绘制的洞庭湖水系图，见图1—1。

洞庭湖的泥沙淤积情况，建国以来逐年均有入湖沙量的实测资料。荆江三口（1959年以前为四口）和四水入湖各测站自1951年至1978年的多年输沙量特征值统计，见表1—1。该表松滋口输沙量为新江口及沙道观两站合计，太平口为弥陀寺站观测，藕池口输沙量为康家岗及管家铺两站合计；湘、资、沅、澧四水入湖控制站分别以湘潭、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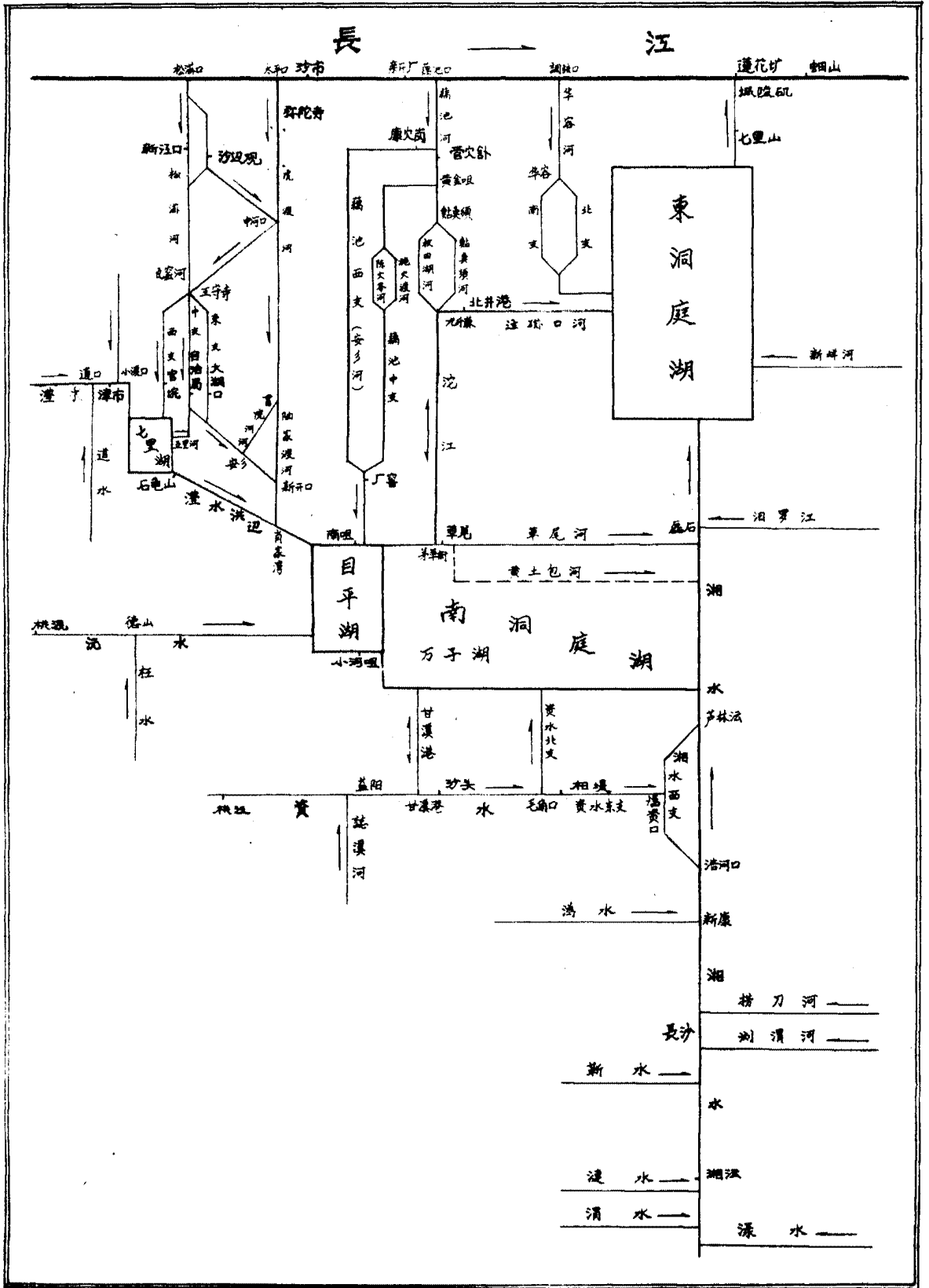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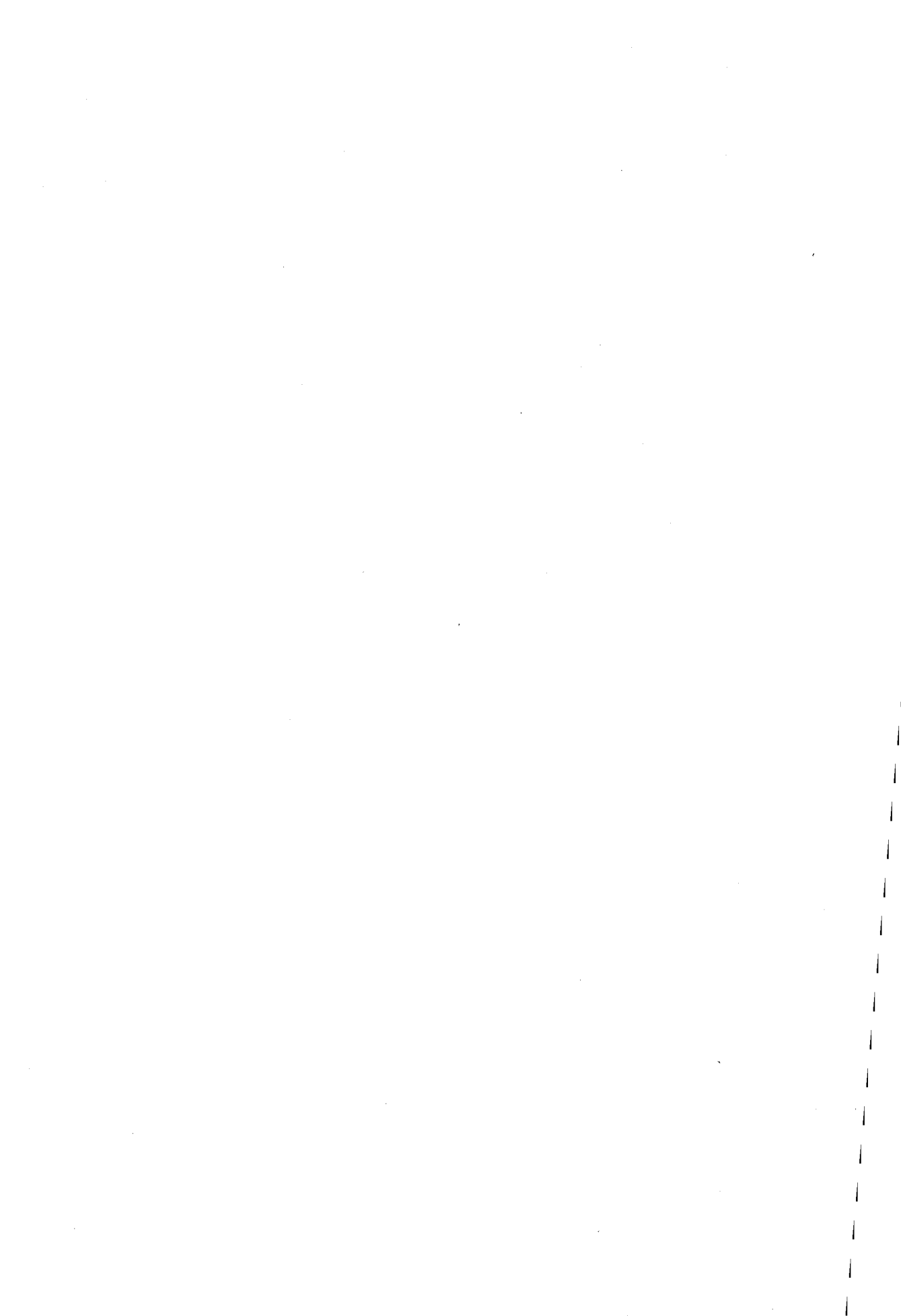


图 1-1



江、桃源、三江口代表，其中1951年和1955年的桃江、桃源、三江口及1952年的桃江、三江口各站输沙量缺测，表内数字系利用流量与沙量相关线插补而得（本表引自《湖南省洞庭湖区基本资料汇编》第二分册）。

由于泥沙主要来自荆江，湖的淤积也是自北向南发展。原有的东、南、西三湖因接纳水流和本身的容积各不相同，其淤积程度也有差异，即在同一湖内的淤积分布也并不均匀。输入西洞庭湖的泥沙来自松滋、太平两口和沅、澧两水，其控制站分别为新江口与沙道观（松滋）、弥陀寺（太平）、桃源（沅水）、三江口（澧水）；泥沙输出西洞庭湖的控制站，则为南咀与小河咀。根据各控制站1956~1977年实测年输沙量统计，年平均进入西洞庭湖的泥沙为0.626亿立方米，输出泥沙为0.33亿立方米，沉积在湖内的泥沙为0.296亿立方米。沉积在西洞庭湖的泥沙，占全洞庭湖泥沙沉积量的30.9%。这些泥沙的大部分沉积在目平湖和七里湖，其余则淤积在入湖洪道中。进入东、南洞庭湖的泥沙，大量来自藕池口和洞庭西湖，其余则为湘、资两水。藕池口的控制站为康家岗、管家铺，西洞庭湖控制站为南咀、小河咀，湘、资两水的控制站分别为湘潭与桃江。据1956~1977年各控制站实测输沙量统计，多年平均入湖沙量为1.017亿立方米，城陵矶输出0.352亿立方米，沉积在东、南湖区的泥沙为0.665亿立方米，占全湖沉积量的69.1%（上述数据均引自《洞庭湖区基本资料汇编》第二分册的表2—11）。

西洞庭湖系指赤山以西诸湖泊，由于泥沙淤积的结果，目前仅存七里湖和目平湖。七里湖原为民国时期大京保赋垸的内湖，该垸在1948和1949年连续溃决，1949年冬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废弃成湖，现位于澧水洪道嘉山与石龟山之间。淤积最严重处为庙基岗对面的洲滩和汇口至甘家湾大堤一带老航道，枯水时仅留左右两航道，两侧洲滩林立，芦苇丛生。目平湖以赤山为屏障，为北水南侵溃垸扩展而成。由于澧水和松滋、太平两口每年有5000万立方米泥沙经过目平湖北端初步沉淀后再下南咀，沅水每年有1000万立方米泥沙经过目平湖南端初步沉淀后再下小河咀，在目平湖南、北两头首先形成高洲，伴随着高洲而来的是芦苇迅速繁殖蔓延。南洞庭湖指赤山与磊石山以南诸湖泊，界于东西湖之间。进入东南洞庭湖的泥沙，大都淤积在南洞庭湖北部，过去溃废的一些古老堤垸及零星洲土均已连成大片湖洲，最大淤高6米、平均2米。目前的南洞庭湖已被划分为两半：北边是南北宽3~10公里、东西长55公里的芦苇及防护林带，约占南洞庭湖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靠近共华垸有一条黄土包河；南边是南洞庭湖的真正湖面和主要泄洪道，约占南洞庭湖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东洞庭湖位于湖区的东部，在岳阳墨山铺、注滋口、大通湖与磊石山之间。1958年调弦口堵塞后，西有藕池河部分来水于注滋口注入，南受西、南湖的转泄及湘水的汇入，东有汨罗、新墙二支流，使东洞庭湖成为三口、四水的总汇合场所。注滋口河已延伸25公里，出口的同兴洲、杨林所一带淤积严重；草尾湖入口的合兴洲、下飘尾、柴下洲、寒湖洲和新墙河的入口淤积也较厚。据1980年《洞庭湖的淤积分析》一文中指出：“东洞庭湖平均高程淤达26米，西、南洞庭湖平均高程淤达29米，就算是洞庭湖的消亡”。该文所载当时各湖的平均高程为：目平湖30米，南洞庭湖28.6米，东洞庭湖24.6米。从目前情况看：目平湖的东、南两侧受山地、丘陵制约，不能再下移后退，随着沅澧三角洲的继续向东南延伸，其最后消亡已不可避免；南洞庭湖如西北部来沙保持不变或由于目平湖的消亡而有所增加，而东北出水口又畅通无阻，